

湖北试点撤销乡镇政协

日前湖北省进行一场关于乡镇机构的试点改革，被人们惯常地列在“四大班子”之中的政协在乡镇撤销，政协工作明确一位负责同志兼管。整个撤销过程在平静中完成。

其实对于乡镇一级的政协职能，一直都存在质疑的声音：“乡镇基本没有民主党派，就算有知识界、文化界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基本上没有统战的工作，设立政协，还有这个必要吗？”与此同时，按照政协章程的规定，并没有要求在乡镇一级设立政协机构。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既没有相关根据又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机构能够出现并大量存在呢？

事实上，这是机构自我膨胀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因人设职”的一个现象。政协在乡镇的组织机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建立起来的。以试点县市之一监利县为例，在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只有县里有政协。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原来的十个大区，共有 30 余名正科级干部，扩充后翻了一番，变成了六七十个。其后干部越来越多。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很多地方在那时搭起了乡镇“四大家”的班子，乡镇一级的政协机构被设立，一些科级干部得以安置。

2003 年湖北省下发 17 号文件，正式推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它试图解决很大程度靠农民供养的乡镇政权，在税费改革后何去何从的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压缩人员和机构。改革选取了 7 个试点县市重点推进，一共有“八大举措”，其中“撤销乡镇政协”因其涉及基层政治架构的变革而受到媒体关注。（据《南方周末》）

我国的养老模式居家为主

我国要建立怎样的养老模式呢？日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副司长阎青春概括了三句话：以家庭服务保障为基础，以社区照顾为依托，以机构供养为补充。

他解释道：“养老回归家庭是趋势，从国际的普遍状况来看，90% 以上的老人最终都要在家中安度晚年。以社区为单位的照顾同样重要，老人们在自己的社区或是在家里就能享受服务，更具人性化。机构养老虽是一种补充，也不可或缺。”

阎青春介绍说，西方发达国家大体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老龄化社会初期，国家大规模兴办机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意识到机构养老对老人的心理可能造成伤害，养老要回归家庭，但不能一下子回归，就先回到社区；最后回归以家庭为主的养老体系。（据《人民日报》）

偏僻小村走出 21 位百万富翁

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通往安徽省庐江县乐桥镇崎岖不平的沙石路上，都会“挤”进约 50 辆挂着上海牌照的各色小轿车，缓缓地向该镇最偏僻的小村——塘拐村。开着小轿车的都是回家过年的昔日塘拐“小木匠”——如今他们是上海的装潢公司老板。一个只有 2000 多人的偏僻小村，在不到 15 年间走出了 21 位“打工”百万富翁。

“塘拐村过去是乐桥一带最穷的村之一！”说起塘拐村，乐桥镇党委副书记唐启银这样介绍道。穷则思变，为了改变自身的处境，塘拐村的多名年轻人拿起了斧头、锯子干起了木匠。

“当时干木匠每年可以挣个 2000 元左右。可这样很很难改变穷乡僻壤的面貌。”塘拐村党支部书记张敦九说。1992 年 3 月，张敦九决定和村会计吴成秀一道到大上海“探探路”，张敦九发现：上海的一幢幢高楼盖好后都需要装修，开个装潢公司肯定“来钱”。

从上海回到村里后，张敦九找到了初中毕业后在村里“游手好闲”的张厚祥，张敦九说：“我们观察到他们有一定文化，人很机警，一旦做起事情来有一定的魄力，所以我们找到了他。”

张厚祥向亲戚朋友筹措了一部分钱款，差额的部分，村里帮他从当地信用社贷了一部分。就这样，塘拐村的第一个公司在上海开业了。果然，第一年，张厚祥的公司就赚了 24 万元。好消息在塘拐很快传开了，在他的带动下，一个又一个塘拐的年轻人开始出师创业。

“塘拐人的创业成功给了周边村民重要的启示。”唐启银说，“在抓住机遇的同时，有关部门一定要学会引导，将农民的自发打工行为引导为自觉创业行为，形成适宜农村青年创业的‘小气候’，同时在他们创业最关键、最困难的时候，要有集体的力量撑腰，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百万富翁’出现。”（据《中国青年报》）

清明习俗为何未遭没落

清明习俗并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传统节日那样面临没落的命运。

这是个叫人哀伤的节日，全世界的中国人为了这个日子，蜂拥而至先人灵前，只为给自己的列祖列宗、挚爱亲朋烧把纸，上柱香。

近些年，清明习俗不但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传统节日那样面临没落的命运，反而出现了文化复归的趋势，各地的祭扫大军呈迅速上升势头。2004 年清明期间，上海约有 650 万名市民外出扫墓，祭扫车辆 27 万余辆。上海媒体估计 2005 年清明有 750 万人出动扫墓。

不只是上海，在北京、杭州、广州……在一切华人聚集的地方，清明祭扫时的蜂拥人群、袅袅香烟都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在缅怀中缓解社会压力

“清明节一般不放假，但我妈妈总要找个周末，去给外婆外公上坟。”已经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小周，对妈妈的行动表示理解。“人去世了，不管相不相信有灵魂存在，都应该以此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毕竟是一种怀念。”

“一到过年过节，我就经常梦到去世的亲戚穿得很少，屋子漏雨什么的，所以特别注意按时给他们扫墓，送点钱花。”祖籍广东的小朱，有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维系他们亲情的，是节日的祭祀活动。“虽然知道没有阴间，但还是希望为他们做点什么，这样自己心理上比较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黄涛说，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经济发展很快，但文化建设没有同步发展，社会上有上有人文精神失落的倾向。清明习俗的兴盛，宣扬了中国传统中的孝道伦理，强调了亲人间的感情联系，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促进了社会上人文精神的建设和弘扬。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说，高节奏的现代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和复杂，斗争频繁，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容易让人身心疲惫，所以人们更加重视亲人之间的关系，渴望祖先的保佑。“中国人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社会，希望借助祖先的力量在陌生的社会中取得成功。”

“中国又是谋略民族，讲究策略和计谋，在中国谋略远远超过了道德，是立身、发财、升官的基础，所以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不坦诚是很自然的，人们也必然感觉价值观的飘忽不定，而把希望寄托给祖先。”胡星斗教授说。

寄托世俗的欲望

“我们小时候过清明节，就是小孩子们穿戴着整整齐齐的白衬衣、蓝裤子、红领巾，一起去烈士纪念碑扫墓。”已经 30 岁的警察小杨回忆道。“因为烈士纪念碑就在公园里，所以我们扫好了墓就玩，所以清明节跟春游一样。”

黄涛说，清明节习俗的主要内容扫墓与春游两大项目中，现代人主要关注清明节扫墓的习俗，春游习俗已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府的提倡，全国各地的学校或单位常在清明组织人们去革命烈士陵园扫墓，缅怀先烈事迹。但现在革命

烈士陵园荒芜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

“中华民族有个特点，就是非常注重过去的事物，可能因为是农业国，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对过去的事物极为依恋，而这就体现在祭祖上。但是中华民族又是一个非常世俗的民族，对钱财非常重视，往往在祭祖的活动中寄托了‘福’、‘禄’、‘寿’这样的极其世俗的价值观，而这就体现在了祭祖活动中的各种仪式上。”

据《商旅报》报道，除了纸扎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旧三件”和电脑、轿车、别墅“新三件”外，纸私人医生、保安、高尔夫球杆，甚至连纸“伟哥”、“安全套”也成为人们为先人准备的祭品，后人对先人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在某些地方，人们甚至给先人准备了纸保镖、纸保姆、纸小姐和纸二奶。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城市地区清明扫墓的盛况，呈现出越来越兴盛的趋势。而祭祖不仅成了人们表达对逝去亲人的孝敬或怀念，寄托自己的亲情的途径，也成了巩固亲情，联络和团结族人，甚至招商引资的方式。

让活着的人安心

为什么在拥有同样的中华文化，而工业文明比较发达的香港、台湾地区，风水、迷信活动比大陆更加“兴盛”？胡星斗认为，其实这些活动，都包含着现实的追求，实际上算是世俗的活动。

相对现实的事物，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一些迷信，来释放身心的压力和能量，一方面逃避现实，一方面幻想可以由此获得“超自然”的力量。

“困扰西方人的，是自然界的神秘，而困扰东方人的，是人命运的变幻。”胡星斗说。人生无常，生命脆弱，在生命转瞬即逝的时候，我们纪念那些逝去的人们，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加安心。（据《瞭望东方周刊》）

国有林场场惊现“皇帝墓”

位于小兴安岭南坡的黑龙江市铁力市东升林场是国有林场，然而在林场茂密的森林中，居然兴建了一座名叫皇陵陵园的公墓，而陵园的建设者，所有者不是别人，正是黑龙江省铁力市林业局。截至目前，皇陵陵园里的墓穴已经售出 100 多座。一些据说请风水先生看过的，能出皇帝的墓地也已经在准备建造中。铁力市林业局深知这些行为见不得光，因此市林业局局长甚至拿出数万元企图对记者进行贿赂，遭到记者的断然拒绝。

更让人开眼的是，为了实现“双赢”，当地民政局、林业局甚至干起了瞒天过海、移花接木和“监守自盗”的勾当：皇陵陵园手续不齐全，铁力市林业局便将陵园占用的次生林地以“荒山荒地”的名义获得了省林业厅的批准，但是并没有得到省民政部门的批准。为修陵园，民政局非但不予监管，还参与到陵园的经营活动中，甚至违法挪用扶贫专项款。（据央视）

女性生育权应由社会共同保障

2004 年 8 月初，刚刚大学毕业的唐女士在老家办理结婚登记后，进入商务人事教育劳动司办公室工作。在 11 月的一次体检中，她被检查出已怀孕，在和丈夫商量后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她把自己的情况向领导汇报后，领导多次找她谈话，明确表示，她要么打掉孩子，要么离开商务部。

2004 年 12 月 17 日上午，办公室主任通知唐女士说司里已决定取消她的录用资格。

其实，女性因生育原因不被用人单位录用的事情时有发生，对怀孕女性的求职给予限制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一些用人单位屡屡对怀孕女性进行限制，是因为考虑到生育子女要离岗，抚养孩子要影响到工作的连续性，会增加成本支出。尽管社会对用人单位这种追求用人利益最大化的不道德表现可以加以谴责，但对于市场经济而言，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无不妥，提出这样的招聘条件也实属无奈。

考虑到生育是人类个体一生中对社会、家庭的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总要有人去承担的，所以女性员工因生育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一种整体需求导致的。

有关法规明确要求用人单位要承担孕期女性的保障责任，但女性生育权保护是全社会受益，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女性孕期的责任显然是不妥当的。

因此我们应设计一个制度，设法让招收并负担女职工生育的用人单位获得一定的社会补偿，调动其吸纳并保障育龄女性的积极性，制定一些政策来鼓励用人单位吸纳这些孕期女性，使用人单位不再拒绝孕期女性。（据《羊城晚报》）

我国公安队伍将扩编

2005 年 1 月 27 日，四川省公安厅宣布，从 2005 年起，四川公安系统将连续 5 年“招兵买马”，每年新增警力 5000 名。而在距四川省公安厅宣布扩编的 10 天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朱明国宣布，重庆市准备新增 1 万名警力。

警力窘迫，远不只川、渝两地为然，显然，我国公安队伍将扩编。统计表明，中国正以 11 名警察/万人这样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警力，应对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五个犯罪高峰。据统计，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第四次犯罪高峰期，发生大案 10 万起，是前三次高峰期刑事大案的 2 倍；而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涌来并持续到现在的第五次犯罪高峰，发案率上升到 80 年代前半期的 8 倍！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形成的公安机关体制是对户口的掌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汪勇说，“任何的犯罪都可以通过户口和组织进行追踪。而现在这种手段已经显得过时并且失效了。”

市场经济要求公安机关以新的方式取代过去被动接受报案的公安运作体制。汪勇说，中国公安机关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发现，像世界上其他国家那样，将警力放置在街面上是减少犯罪发生的最好方式。（据《海峡都市报》）

超高层建筑存在严重安全问题

一旦出问题越搞越可怕

如果你在大楼第 63 层工作，离地面 200 米，大楼突然发生火灾，你该怎么办？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北京市公安局奥运安全专家组专家金磊说，很多在超高层建筑上班的人，几乎从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这个问题却日益威胁着城市安全。

根据规定，高于 24 米的建筑属于高层建筑，高于 100 米的建筑属于超高层建筑。金磊说，城市安全部门曾经做过一个试验，让一名身强力壮的消防员从第 33 层跑到第 1 层，用了 35 分钟。如果是一名身体素质一般的工作人员或老人、小孩，所需时间肯定翻番。而火借风势，30 秒内就可以从第 1 层到达第 33 层。这样算来，人们跑到楼外逃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正是担心超高层建筑的安全问题，2002 年 7 月 14 日揭晓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方案，已经没有了数百米的超高层双塔建筑。金磊说，这是规划师和建筑师有了安全意识后，冷静思考做出的理性决定。

不可挽回的城市景观

对北京城区的规划，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提出建议，以北京西部的五棵松为中心，建立新北京城，在新城区盖高楼，老北京城则以景观保护为主。遗憾的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现在的北京现代化高楼和四合院混杂，摩天大楼和古城遗迹穿插，为了盖高楼而强行拆迁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建筑。

建筑专家建议立法削高楼

广州高楼密集程度居世界前列，广州市民促进会日前结束的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呼吁立法限制市区高层建筑。调查显示，广州市现有 18 层以上的高楼 7000 多栋，居世界前

列。其中，100 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有 360 多栋，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一栋。

高楼造成了高容积率，高容积率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口过度集中，绿化空间被占据，人均绿地面积减少，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广州去年灰霾天气高达 144 天，过密、过多的高楼群难辞其咎。而且，城区高楼一般都建在路边，既不利于交通，也容易形成两道回音墙，造成噪音污染。

另外，有关调查显示，我国高层楼宇空置现象相当严重，而日常管理开支又十分高昂，一批超高层建筑几乎已经被庞大的开支压垮。建筑高度超过 300 米后，建筑成本很高，同时还带来一系列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内部交通问题，已经失去了所谓的节约土地的意义。

在发达国家，除了标志性建筑外，基本上不建高楼了。目前国内的上海、南京等地也都相继立法，限制市区的高层建筑。

（据《中国青年报》）

硕士公务员被逼下岗惊动总理

他叫曹再学，今年 29 岁，是一名拥有采矿及矿业安全生产管理的高学历人才，2003 年他被阜新市人事局招录为公务员并分配到该市国土资源局工作。

莫名被取消编制无限期下岗

2003 年 4 月 9 日，曹再学在国土资源局完成了一个月的试用期，国土资源局的人事领导到辽工大全面了解了曹再学的成绩及表现之后，双方签订了《全国研究生就业协议书》。

2003 年 12 月 31 日，在阜新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了半年的他才领到了第一笔工资 2400 元。

该局机关党委书记刘铁军告诉他：“由于你没有人事关系，每月 400 元已经是照顾你了！”曹再学对此虽难以理解，但没有任何办法。

到了 2004 年 1 月 16 日，刘铁军通知曹再学：“经国土局党委研究决定，推翻了市人事局批准你的公务员编制，原则上同意你进入自筹自支的事业编制，并超编运行，重新办理人事关系。”刘铁军同时强调：此项决议是任何人都改不了的。

老实人被潜规则算了旧账

2003 年 8 月 10 日中午，刘铁军将曹再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曹回忆说，刘当时十分生气地训斥他说：“谁进国土资源局都得给三万元，给人事局一两万元；你怎么进来我就怎么将你整出去，即使你正式进来了，我也照样将你弄出去！”当时在场的还有人事副科长刘金利。

总理、省长批示下令化解刁难

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曹再学只好依照程序，向省政府、国务院信访办递交申诉状。

去年端午节那天，他突然接到了来自国务院的电话，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材料已经分别转到有关部门，并转告曹再学要好好工作，有什么问题及时向组织反映。

刘金利也承认他们先后接到了温家宝总理和张文岳省长的批示，目前已经同意恢复曹再学的公务员身份，补发工资。

可是，曹再学在这里会有好日子过吗？他所学到的知识还能用上吗？（据《时代商报》）

孙科晚年的艰辛岁月

1949 年 7 月，孙科去广州参加国民党非常会议返回香港后，意气消沉，认为“大局已无法挽回”。12 月 10 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北，没有通知孙科赴台。孙科意欲申请赴美，但台湾当局不给他发放护照，无奈中只得暂住香港。

孙科在香港居留期间，每天都有滞留在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叩门拜访，向孙科告贷。孙科每以 10 元港币打发这些昔日的军政人员，后因人数日益增多，乃改为 5 元，但前来借钱的人仍持续不断，遂决定尽速离开香港。孙科刚到香港时，即向港英当局申请出国护照，但在 1949—1950 年间，孙科却为一私人之事所困扰。广东籍某女子声称与孙有染，向台湾和香港两地法院同时控告遭孙科遗弃，要求孙支付一笔数目不菲的款项。此女子得到孙科政敌的支持，其目的是阻止孙科前往台湾。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进行了诉讼，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直到 1950 年春，香港法院判决孙科胜诉，他才得以出国。

1950 年秋，孙科携夫人经印度、希腊赴法国，抵达巴黎后，暂住老友、前驻苏大使傅秉常在北京郊外的别墅，开始了他晚年流亡海外生活，是年孙科 60 岁。

孙科虽流亡海外，但起初生活却颇为优渥。1950 年他寓居巴黎后，养病之余，经常游历欧洲各国。绮丽的异国风光，丰盛餐饮，似乎已渐渐洗去孙科多年从政的疲惫。

孙科在巴黎寓居两年后，决定转往美国。次年迁居加州洛杉矶西部圣塔莫利卡。

孙科深居简影，俨然“闲云野鹤”，在南加州乡间闭门读书，只是生活颇为清苦。甚至有一段时间，孙科夫妇因经济窘迫只能吃番薯充饥。然而，他每天仍到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家中也堆满了书籍，完全过着一种普通老人的困窘生活。

（据《海内海外》）

深圳养一个孩子要 50 万

日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刊发了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的一份调研报告，称根据对上海市徐汇区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父母养大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平均要花費 49 万元。此报道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那么，在深圳养一个孩子的花费又如何？深圳市统计局一位对居民消费颇有研究的专家认为，只要以深圳居民消费支出水平及孩子占家庭消费比例为基数，可以推算出深圳养孩子成本。

根据 200 万户籍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3 年，深圳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9960 元，一个普通的户籍居民，在 16 年间的生活费用为 31.94 万元。

按一家 3 口人以一个孩子占普通家庭消费比例在 40% 至 50% 比例计算，深圳 0 至 16 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为 38.32 万元至 54.19 万元。

从中我们至少可得出一个结论，深圳 0 至 16 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大致在 40 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这一成本肯定高出 50 万元。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结论仅是对深圳户籍人口家庭调查推算，并不包括非户籍人口家庭孩子抚养成本问题。（据《都市资讯报》）

科研单位“旅游开发”破坏海洋资源

海底的珊瑚礁被喻为海底的热带雨林，对于保持海底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海南省三亚市的珊瑚礁国家自然保护区内鹿回头湾沿岸海域珊瑚礁资源及其生态系统正遭受严重的人为破坏。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发生这种破坏的恰恰正是在专门从事海洋资源研究和保护的某科研机构三亚—实验站内。

科研单位在实验站内搞“旅游开发”

2005 年 1 月下旬，记者在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小东海鹿回头海湾内的某科研机构—实验站采访时发现，一个初具规模的旅游潜水基地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目前已经建起了一批规模较大的相关建筑，有很多身穿潜水服的潜水教练在附近海域频繁地下潜和布放浮标。据了解，这是这个实验站利用站内的相关海域和海南三亚一家潜水俱乐部违规合作开发潜水旅游项目。

专家指出，这一开发项目势必对当地珍贵的珊瑚礁资源造

成严重破坏。而珊瑚礁生态系统一旦遭到人为破坏，至少要六十年才能恢复。

是保护环境还是搞经营创收

记者随即采访了该实验站站长张愚。这位站长开始先是对此事矢口否认。后来才说，该站是让新海洋俱乐部帮忙做园林花草，而并没有让他做潜水项目。对于该俱乐部正大张旗鼓地建设潜水基地，该站长竟然说：“我们目的只是请他们做保护，但他们即使是做了潜水项目，也不是我们所能管的。”

海南三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根据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规定，该实验站并不具有开发这一海域的资格，其私自组织招标并进行开发是违法的。

环境被破坏的恶果已经显现

由于近年来大量进行潜水旅游开发活动，当地的珊瑚礁资源已经受到明显的破坏。现在该岛从事潜水开发的许多海域的沙滩已经出现硬化趋势，许多过去洁白的沙滩已经堆满从海底冲刷上来的珊瑚死体，顾客已不能任意地在沙滩上光脚游玩，环境被破坏的恶果已经显现。

目前三亚的珊瑚礁破坏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在保护区的鹿回头湾附近有大面积的麒麟菜养殖，还有个别的鱼排养殖，对珊瑚礁生长有一定的影响；近几年来，时有个别炸鱼现象发生，以往长期的频繁炸鱼使保护区的珊瑚及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保护区建立以前和建立初期采珊瑚到市场上销售的现象非常严重；保护区偷采珊瑚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专家指出，潜水旅游的游客往往是初学者，对珊瑚礁直接破坏的可能性较大，长期开展潜水活动，加上游客受珊瑚礁保护教育的不够，会碰碎造礁石珊瑚。平台和观光船抛锚也可能破坏珊瑚，旅游垃圾如不进行处置不但会影响景观，也容易被带入海中影响近海岸、海洋环境。海洋旅游业对珊瑚礁资源的破坏是非常致命的。（据新华网）

警惕地域歧视渗入国家机关

近日，深圳市龙岗警方在辖区怡丰路上悬挂了“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和“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 500 元”的大横幅，在当地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质疑警方这种带有地域歧视色彩的做法，警方则称此举可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据 3 月 30 日《南方都市报》）。

看到这则新闻，我不由得想起了美国前总统林肯的一句名言，林肯在呼吁民众反对种族歧视时说道：“今天发生在黑人身上的事情，明天可能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而深圳龙岗警方的这项带有地域歧视色彩的举措，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今天的标语是“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明天会不会出现“坚决打击广东省犯罪团伙”的标语呢？如此推导，恐怕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会幸免登上这个“黑名单”。此外，由于“敲诈勒索”是一个发生率相对较高的犯罪行为，依此逻辑，在所有犯罪行为存在的地方，所有人都将被列入被怀疑和打击之列。

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充满歧视意味的标语竟然出自公安机关之手。公安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犯罪侦查权的行政机关，基于其国家机关的地位，而使人们对其有较大信任。正因如此，如果公安机关一旦滥用国家赋予它的权力，就极有可能对公民的权利造成损害。群众会因此对身边的河南人产生更多不该有的偏见。

因此，国家机关在行政中如果渗入了地域歧视，其危害是相当大的，它不仅损害了被歧视群体的名誉权等权利，更为恶劣的是，它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与可信度。警惕地域歧视渗入对国家机关而言是十分必要的。（据《齐鲁晚报》）

教育专家痛陈奥数三大罪状

日前，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历数了“奥数班”三大“罪状”。

“罪状”一：奥数及奥数班的商业因素过于浓厚。目前社会上大量的奥数班及竞赛，多数是为谋取经济利益的商业行为，一搞竞赛就组织收费。很多学校老师就积极准备奥数辅导，也赚这个钱。

“罪状”二：导致校长不正确的政绩观，扰乱数学等学科正常教学。很多校长把学生在奥林匹克竞赛获奖作为自己的政绩，一味向学生灌输数学、物理等个别学科的技巧性，对数学及其他学科的正常教学带来很大影响。事实上，国外也有奥林匹克竞赛，但是有这方面特长和兴趣者，明天考试、今天报名就行。我们的学校却是从一年级开始，就安排了许多培训试验，搞各种竞赛。学生不是为了培养数学思维习惯，而完全为了竞标，为了取得竞赛成绩。

“罪状”三：强训练扼杀了孩子兴趣。许多学生靠奥数获奖保送上了大学，却拒绝选择数学或物理学科，而选了其他专业。学生已经厌倦、恐惧数学，强训练就导致了这样的恶果。

利润惊人

一位在北京市做了近十年的奥数教练坦言：“一个奥数，带出的是‘奥数经济’，它利润惊人，养活了不少人！”据了解，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有 120 万左右的学生，随着近几年奥数培训热的升温，仅以每年有 50% 的学生参加培训来算，培训费用平均 300 元，其催生出来的培育市场就接近 2 亿元的市场规模。另外由此衍生出来的奥数培训教材市场也是蔚为壮观。

叫停奥数

北京市教委不久前要求全面叫停中小学各类收费辅导班。小学、初中不得开设“实验班”“特色班”“创新班”“奥数班”等各类性质的教学行政班。

广东省教育厅 2004 年底就下发通知，强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入学和转学一律不得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测试或变相考试、测试。

最近，河北省也全面叫停义务教育阶段各类“奥数”及知识类竞赛活动，暂停举办各类重点班、特长班和“奥数班”等特殊配置的班级。

浙江省即将出台的有关减轻学生负担的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停止举办小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针对社会上的各种奥数补习班，教育部门人士称，国家尚无禁止社会力量举办奥数班的相关规定，目前还不能做出不准举办奥数班、奥数学校的规定。今后，教育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社会奥数班的规范管理。（据《华西都市报》）

女儿沉迷网聊 老父上网证婚

王大爷是长沙市某重点中学的退休英语教师，有一双儿女，女儿大学毕业后在长沙一个高新技术企业从事行政工作。

“我女儿身高有 1.61 米，别的什么都好，就是下班后喜欢呆在电脑旁和别人聊天，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好几次想和她聊聊找对象的事情，她都拒绝了。我觉得是网络害了她，决心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帮助女儿从虚幻的网络聊天中解脱出来，重新回到现实。”王大爷对记者说。

为了帮助女儿戒除网瘾，王大爷决定“以身试网”。他认为，这样跟女儿沟通时有了共同的话题，也好劝说女儿。不料王大爷上网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后来觉得女儿之所以沉迷上网，是因为在现实中没有找到自己的感情归属，于是干脆把自己的网名改为“为女选婿”，帮助女儿找起对象来了。由于王大爷的网名奇特，网上很多人也都找他聊天，有妈妈为儿子找媳妇的，有年轻人毛遂自荐的，王大爷都会一一回复，并约定时间和符合条件的小子见面。由于种种原因，双方都没有相中。

王大爷最后给出了自己的 QQ 号码：332816411，他笑着说：“我还会继续帮她寻找，要是有一小伙子愿意应征，不妨加我为好友。”（据《长沙晚报》）